

# 人才竞争、资源配置与理念重审： 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若干思考

□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 一、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人才竞争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由于院校竞争的客观存在,很多高校存在“人才饥渴”现象是事实。高等教育实践中重视人才工作没有错,但为了迅速扩充人才队伍,提高科研绩效,改进学科和大学的排名,不少学校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存在“过度简单化”的倾向。很多大学的相关政策文件直接根据人才头衔、主持的课题、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奖励将人才分成三六九等,然后为不同层次人才提供不同的年薪和科研启动费。人才工作的“数目字管理”一方面激化了学术的功利主义和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内涵式发展。因为隐藏在分数、身份、头衔、课题、论文、获奖背后的人才的真正质量或能力被大学的管理者忽视。以至于高等教育领域中很多所谓的学术项目评审或人才项目评审根本不是在评审学术水平或人才质量,而是在评审那些学术的“替代品”(学术发表的简历和个人简介)。这种风气导致了“发表为王”,学术的品质和学者的品质趋于“淡化”。最终,由于人才评价的过度简单化和功利化,学术研究的机会主义在我国高校的人才流动中越来越普遍。头衔、论文、课题、获奖都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学术资本”。由于面临评估和排名的巨大压力,高校在人才引进上的“数目字管理”还会诱发后续考评中的“绩效主义”。大学组织与学术工作的特殊性,使简单的量化评价非常容易导致逆向淘汰,即那些原本真正想做学问的人有可能迫于绩效压力不得不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而选择学术投机。大学的非政府、非营利性以及高深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适合于强激励的组织,过强的激励无法改进大学的品质,反而会败坏学术风气、恶化学术生态。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里的一流学术团队,更多的是靠一种内在自我驱动力在持续发展,而不是靠行政的规章制度在驱动。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真正关键的问题

是主事者从一开始就要“选对人”,并让他们一起快乐地工作。那些公认的卓越大学对其员工的品质无不格外留意,并力争在组织内部每个层级和每个岗位都配置最优秀的人员。一旦发现“不合格者”会毫不犹豫地清除。对于大学而言,真正卓越的学术团队或管理团队绝不在于规模的庞大,而在于品质及其结构的卓越。

由于人才竞争的持续蔓延,与那些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相比,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在我国各高校间人才与薪酬出现了类似悖论的现象。一般而言,在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人才的水平、薪酬应与高校的层次成正比,即在较好的大学工作且水平较高的人才拥有较高的薪酬。但我国的现实是,很多水平中等甚至一般的研究者,在水平中等或一般的学校,获得了同行中较高甚至最高的薪酬。现行体制下,即便在同一所学校里,由于薪酬或绩效不是根据学术能力或贡献来确定,而是参照人才的头衔、课题、获奖等外在因素,有时也不是学术贡献最大者薪酬最高。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也一样。“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一流大学的人才引进一定要坚守一流的标准、宁缺毋滥。在“双一流”建设中,如果只是为了在极短的时间扩大师资规模以提高排名,人为降低进入标准,高薪引进大量水平中等或一般的人才。其结果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不但可能建不成一流的大学和学科,反倒会使后续的人才引进缺乏必要的空间和资源,从而导致学校发展乏力。

## 二、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资源配置

当前在我国“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政府如果将过多的资源配置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而相对忽视了提升高校培养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的能力,长远来看,很可能会得不偿失。“过分地强调获取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可能会有损于一所大学甚至整个学术系统。它可能把精力和资

源从更重要的或许是更实际的目标上挪开,且过于关注建设面向研究和精英的大学,也会忽视培养更多学生或服务国家需要。大学很可能确立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损伤教职员工的士气和表现。”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讲,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是极其昂贵的“奢侈品”,绝非多多益善。一旦重点建设的规模过大,受到财政资源和优秀人才总量的限制,很多大学最终只不过是空挂“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牌子,绝无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因此,作为一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央政府需要对“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规模,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规模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进行谨慎的评估,以确保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可完成性。此外,面对资源依赖和人才竞争的双重约束,为了确保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在后续进程中,我国“双一流”建设必须严格实施“动态调整”,并逐步确立“总量控制”的基本原则,即建设高校和学科不能只增不减,以避免重点建设单位越建越多,最后“徒有虚名”。

### 三、在“双一流”建设中的理念重申

历史上,在象牙塔的时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之于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程度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通常政府投入的经费越多,这个国家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进步就会越快。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就表明,“学术自由和研究型大学之间好像存在非常微妙的平衡。只要限制不是太严苛,在学术自由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可能建立相当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当然,对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优异表现,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大学的迅速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新模式;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大学的既有成功恰恰得益于对西方大学的部分模仿,同时,由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很快就会触及“玻璃天花板”,很难真正成为世界一流。有学者认为,若不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减少科层制以及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中国高校就难以成为领导者,因为科技和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产生这种创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尽管高等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个人的能力和对知识的批判性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下才能实现,也不意味着一个领域的全球模仿和政策借鉴必须应用到另一个领域。两种看法基于相同的事

实,表面上看,观点完全相左,但实质上只是“看好”与“看衰”中国的态度的微妙差异,没有实质的区别。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大学在通往世界一流的过程中既改变着自己也会改变着世界一流大学本身。“过去30年来,观察者看到了世界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而现在有必要了解中国是如何在广泛的维度影响着世界。在中国和全球化之间,我们不应该选择性地认为中国被国际力量所改造或者中国改造着全球结构。相反,我们应该同时考虑所有的视角。”最终,通过“双一流”建设,中国能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或者能否开创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一种“既有全球竞争力也有文化相关性的学术模式”,不是理论上可以预测出来的,也不是一种乐观或悲观的态度可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做。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状,一方面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取得了长足进展,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靠财政驱动和量化评价而非制度的优势。如果说当前的政策工具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起步阶段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那么随着中国大学在排行榜上的名次逐渐上升,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策略与政策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认真考虑学术生产力的成本以及有效的学术贡献,而不只是论文数量的增加和大学、学科的排名提升。进一步来说,为能够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进行全面且根本性的变革,必须从单一的政策驱动改革向政策驱动改革、市场驱动改革和知识驱动改革齐头并进转型;尤其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改变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充分调动大学自身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扩大高校办学和改革的自主权。就正在推进的“双一流”建设而言,当前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可能远比人才储备方面更有优势。但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资金和人才必须保持同样优越,仅仅有钱并不能成就世界一流大学,关键还是要能够通过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汇聚全球科学精英。对于“双一流”建设,中国的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归根结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仍然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可能创造新的高等教育规律。面向未来,中国大学要在科学与知识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要在世界大学群体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保持人才、资源和理念的平衡,必须在遵守学术规则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并对中国文化与知识传统的复兴承担起必要的义务。

■ 《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期,约10000字